

## 建安士不遇詩考察

隋雨竹<sup>59</sup>

水原大學 國際學院

摘要：建安詩歌上承《詩經》、楚辭等古詩之源，下啟六朝唐代等近體詩之盛世。在內容題材及表現手法上，既有對《詩經》等經典的繼承，也以高揚的獨創性標示出其時代特徵和文學成就。特別是在《詩經》中就已經出現的士不遇題材的詩歌，正是經過了建安詩人們的不斷革新和發展，才趨於成熟，成為中國古詩的一種獨特類型。基於以上原因，本文對建安詩歌中的士不遇主題作品進行考察，進而界定這一時期的士不遇詩的範疇，並梳理出三種不同類型詩的內涵及特點。

關鍵字：建安，士不遇詩，範疇，類型及內涵

### I. 緒論

一般來說，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士不遇詩是指以表達古代士人懷才不遇為主要內容的詩歌。這類詩是隨著中國古代士階層的出現而出現，即最早的“士不遇”詩是出現在春秋時代的《詩經》中。後來雖然在楚辭和漢賦中也出現了一些寫“士不遇”的作品，但就詩歌創作來看，戰國和兩漢時期幾乎沒有什麼作品。直到漢末建安時代，“士不遇”詩才又重新煥發生機。由於建安時期特定的時代背景等因素的影響，士不遇詩既繼承了《詩經》、楚辭等作品的傳統，也表現出了新的特點。因此成為研究建安文學時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部分。

但縱觀現代建安詩的研究歷程，學者們對士不遇詩的研究卻是“若即若離”。大部分的學者都認同建安詩中存在著這一類士不遇詩。特別是建安七子等文人在建安前期四處漂泊時曾寫過一些，但對此卻沒有太深入的研究，而且研究方式大同小異，大多是為了說明建安文人們政治上的變遷或精神感傷等而淪為史料。1990年以來有學者從曹操和歸附曹操的文人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如孫明君的《漢末士風與建安詩風》<sup>60</sup>，施建軍的《曹操與建安諸文士》<sup>61</sup>等，指出建安文士們歸附曹操後政治上並不得意，並且這種怨言在詩歌中有所表現。但他們沒有明確地將這些作品歸類為士不遇詩，也就沒有

<sup>59</sup> 水原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sup>60</sup> 孫明君，《漢末士風與建安詩風》，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sup>61</sup> 施建軍，《曹操與建安諸文士》，《江淮論壇》，2003年02期。

從士不遇的角度進行深層次的研究。此外，雖然曹植的後半生極度失意，並且在其作品中多有表現，但由於其貴為王子的特殊身份，很少有學者將其失意和士不遇聯繫在一起。這些都是建安士不遇詩研究中尚待解決的問題。

因此，針對上述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本文通過對建安士不遇詩範疇的界定來重新梳理建安士不遇詩的類型和內涵。

## II. 建安士不遇詩的範疇設定

懷才不遇是士不遇的基本內容，但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社會環境、不同的個體經驗，士不遇的情況也不同。因此，研究建安士不遇詩的前提條件就是對建安士不遇詩的範疇進行整理和設定，這樣才能明確建安士不遇詩到底是什麼。

建安士不遇詩的範疇設定主要涉及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是時間的界定。一般研究建安文學或建安詩歌，其時間斷限與歷史上漢獻帝建安時期並不完全一致，時間的上限往往回溯到漢獻帝初平年間，時間下限則要到魏黃初、太和年間，但因這時期重要作家的創作活動主要在建安年間，因此統稱為建安文學。筆者設定建安士不遇詩的時間與此相符，大致歷時 40 年左右。

其次，是對建安士不遇詩的創作主體的界定。也就是說建安士不遇詩中的“士”究竟指那些人？根據史料記載，漢末建安前期社會動盪，政治不穩，皇帝無權，軍閥割據。在這種情況下，士人們為了得到一個做官的機會常常輾轉他鄉，漂泊客居。然而即使這樣，他們也很難得到自己理想的官職，發揮自己的才幹，因此，這一時期的文士們大都有不遇之悲。但由於建安時期距今久遠，一部分文士們的詩歌已經亡佚，筆者僅就今天仍有作品存世的文人進行考察。主要有王粲，劉楨，陳琳，阮瑀，徐幹，繁欽等人。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曹植的不遇。這關係到能否將其失意詩作歸納到士不遇詩的範疇中。建安文人中，要數曹植才氣最盛，人稱之“建安之傑”、“才高八斗”。他不但是位才華卓越的文學家，而且有著宏偉的政治抱負。早年的曹植和曹丕一樣過著貴公子的生活，雖然少年也曾經歷戎馬，但他們的青年時期主要處於曹魏政權蓬勃發展的上升時期，甚至曹操一度想立曹植為繼承人。因此，早期他有著“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sup>62</sup>的宏願。但當爭奪繼承權失敗，曹操死後，曹丕對其壓制防範，名為王侯而實為庶民，甚至連人身自由也沒有，動輒得咎，屢遷封地，生計維艱。但在他心裏仍然希望能得到任用，能報國立功，希望曹丕及後來繼位的曹叡能給自己機會。正如他在《雜詩》中所說“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sup>63</sup>。可權力的頂端往往是最殘酷的，作為最高統治者不會允許任何人

<sup>62</sup> 曹植《與楊德祖書》，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p154。

<sup>63</sup> 曹植《雜詩》，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p380。

覬覦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尤其是曹植這個曾經爭奪王位的敵人。因此，他們始終沒有給曹植任何機會，而是曹植心中那建功立業的理想也只能被壓抑。王位爭奪是造成曹植不遇的根本原因，但不能成為考察曹植失意詩作的唯一標準。事實上，“三曹”與“七子”概念的提出，明顯可見曹植與建安七子等一般建安文人的地位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恐怕不只是文學成就上的不同，還有政治地位的差別，即三曹是屬於統治階層，而曹植貴為王侯。因此，傳統的學者礙於“士”的等級觀念，而往往將曹植的不遇詩與一般建安文人的士不遇詩劃分開來，單獨論述。然而，從詩歌本體來看，曹植的不遇詩與一般文人的不遇詩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由於各種因素導致自己無法施展才能而鬱悶。今天來看，如果仍然按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來劃分作家或文學作品的屬性似乎不太合適。因此，筆者在本篇論文中將曹植和其他建安文人們一起考察。然而這並不是說曹植的不遇就完全等同於其他建安文人的不遇。造成不遇的原因不同，個體的經歷不同，曹植的士不遇詩還是與其他文人有一定區別的。

第三是對作品內容的界定。既然是士不遇詩，詩歌的主要內容是述說自己懷才不遇。但迫於各種因素，文士們有時候難以直抒其言，而是將這種壯志難酬的情感寄託於景物等婉轉地表達出來。因此，這類借景或借物抒情的詩實際上是士不遇詩的另一種類型。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遊仙詩，其內容雖是寫遊仙但表達的實質卻是借遊仙來抒發不遇的無奈。表面看起來似乎遊仙和不遇沒有太大關係，但結合詩人的人生境遇來分析就很容易破解詩歌的真實內涵。雖然這類遊仙詩不多，但卻是從建安詩歌才出現的，具有一定的示範意義。

### III. 建安士不遇詩的類型及內涵

中國的詩歌大致可分為寫實和抒情兩種風格，這兩種風格都源於《詩經》。孔子在評論《詩經》時曾說：詩可以怨。這種怨實質上就是“對自己所遇事物、所處環境等不滿而產生的一種否定性情緒”<sup>64</sup>，正是這種情緒成為中國古代文人的創作動力，表現“士不遇”主題的文學作品便是其中之一。不遇導致文人內心無限哀怨，這種情緒無處釋放，只能借助詩來抒發，因而士不遇詩往往具有特別強烈的抒情性。因此，筆者以表達不遇情感的方式為標準，將這些士不遇詩劃分為三種類型。

#### (1)直抒胸臆型

顧名思義，直抒胸臆即將心中所想或情感直接抒發出來。這是中國古代士不遇詩最常見的一種抒情方式。但自楚辭以來抒發不遇主要是以賦的形式，由於詩的篇幅結構等與賦差異較大，因而士不遇詩不僅主題更加突出，而且

<sup>64</sup> 趙國乾，《中國文學“士不遇”主題的文化審美闡釋》，《雲南社會科學》，2004年3期，p118.

也更重視情感的抒發。至於士不遇詩的類型化以及抒情模式的建立大多開始於建安詩歌。

由於建安前期社會動盪，文人大多四處避難，戰亂頻繁，難免重武力而輕文治，因而文士不遇的狀況時有發生。陳琳正是這類文士的代表，他才華橫溢，一直想在亂世中尋找立功揚名的機會，但始終不過一介刀筆書吏，壯志難酬。如其《詩》：

春天潤九野，卉木渙油油。紅華紛曄曄，發秀曜中衢。  
仲尼以聖德，行聘徧周流。遭斥厄陳蔡，歸之命也夫。  
沉淪眾庶間，與世無有殊。紆鬱懷傷結，舒展有何由！  
轆軻固宜然，卑陋何所羞。援茲自抑慰，研精於道腴。

此詩是陳琳早年之作，原為單獨四段，今人逯欽立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三種認為：“以上四詩《韻補》通入尤韻，當是一篇之辭。”<sup>65</sup>“從意義上判斷，四段之間亦有聯繫，後三段之間聯繫尤為緊密。”<sup>66</sup>因此，筆者此處將其視為一首詩。詩中先描寫了春天的勃勃生機，之後便寫了孔子也曾四處漂泊，甚至困厄於陳蔡間。陳琳以孔子自比，像孔子這樣的聖賢也會不遇，自己雖然才華出眾也難免淪落到與普通人一樣的境地。但這種不遇還是讓他憂傷鬱悶，無法釋懷。最後，詩人說到貧賤坎坷並不是什麼羞恥之事，以此來安慰自己，在困窘中專研道的真諦。雖然此時最後歸之於道，但卻不是消極的逃避，而顯露出自我涵養、蓄勢待發的氣勢。

歸附曹操後，建安文人在鄴下最多的活動就是宴集唱和，宴會詩也就成為他們文學創作的重要形式。但不同於六朝宴會詩的浮華和空洞，建安詩人沒有沉淪於輕歌曼舞和美酒佳餚，即使在遊宴中也無法抹去心中不遇的惆悵，如陳琳的兩首《遊覽詩》。其一：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為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  
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黯黯天路陰。  
惆悵忘旋反，歔歔涕沾襟。

詩人身在遊宴之中並不快樂，客居的生活讓他並不稱心。滿懷傷感漫步長苑林，然而這裏只有蕭蕭的山風和陰暗的天際。這樣的場景正代指自己的前途灰暗，沒有希望。從而流落出詩人數載漂泊而功業無成的感傷。可以說，陳琳此時的心境與早期不遇時的心境是不同的，早期他還能氣定神閑的專研道義，但這時卻是真的惆悵起來。此時的陳琳已經歸附曹操，但這並不是完美的結局，不過是陳琳四處為宦的人生中最後的一站，而這一站卻也並不能志得意滿。此時的陳琳似乎已經看到自己人生的盡頭，因而更加感傷，甚至

<sup>65</sup>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中華書局，1993年，p368.

<sup>66</sup> 吳雲主編，《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p131.

絕望。晚唐詩人溫庭筠在其《過陳琳墓》一詩中說“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正說出了陳琳一生的不遇和失意。又如《遊覽詩》其二：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閒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  
 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回顧覽園庭。  
 嘉木凋綠葉。芳草織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  
 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寢房。慷慨詠墳經。  
 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此詩也寫於歸附曹操之後，安居鄴下時，內容與其一相似。表達了歸附曹操後，並沒有得到重用，而過著閒居的生活，這樣的生活讓他不開心，於是和友人一起遊園。然而看到樹葉即將凋落，繁花也即將枯萎，詩人不禁聯想到自己年華將盡卻志向不遂而無限感傷。但與其一無法釋懷的結尾不同，此詩在最後還是鼓起信心，希望能夠追隨曹氏可以建功立業。同時遊覽詩，同是表達自己不遇的境遇，但前後兩首的情感卻也不盡相同，表現了詩人豐富而細緻的情感變化。

被譽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出身名門，十四歲拜見東漢大學者蔡邕，蔡邕稱其“有異才”。然而王粲年少便曹遇董卓之亂，十七歲離開長安赴荊州依附劉表。從初平三年（192）到建安十三年（208）也就是他從十六歲到三十二歲期間，一直避亂於荊州，但劉表因嫌棄王粲相貌不美、性格放達而不重用，這使自命才高的王粲在漫長的避亂生活中產生了無窮的懷才不遇之感。如他在《贈士孫文始》一詩中說到：“龍雖勿用，志亦靡忒。”龍雖勿用，出自《易》“潛龍勿用”，此句意為雖然不被重用，但不要改變自己的志向。雖然詩表面說孫文始，但實際上何嘗不是王粲對自己的勉勵。另如《贈蔡子篤》中的“人生實難，願其弗與”一句，也表達了他在荊州時懷才不遇的心境。

表達更為直接的如《雜詩》其四：

鷺鳥化為鳩，遠竄江漢邊。  
 遭遇風雲會，托身鸞鳳間。  
 天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  
 邂逅見逼迫，俯仰不得言。

這首詩應寫於王粲歸附曹魏之後。詩中首先回顧了荊州時期的不遇。詩人以鷺鳥自喻，表明自己本是具有雄才偉略之人，但卻不得不委曲求全化為普通的鳩，躲避到江漢邊的荊州。後來風雲際會，得遇明主曹操，也經常往來於權貴之中。但自己天性桀驁不遜，拙於世故，常常被受壓抑，不能達成所願。王粲於建安十三年歸於曹操。早在他之前劉楨、徐幹、陳琳、阮瑀、

楊修、路粹、吳質等人已抵鄴城，和他同年來到的有應瑒、繁欽、邯鄲淳、仲長統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往往認為王粲在歸附曹操之後，官至侍中，應該仕途順暢，但這一首詩卻表明了歸曹後，詩人仍然生活得十分壓抑。

曹植的詩歌創作以曹丕繼位為界大致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公子生活使其詩作大都慷慨激昂，後期由於曹丕及曹叡的政治打壓使其常有感懷身世，抒發懷才不遇之詩作。其中，直接抒發情感的詩作如《雜詩》其五：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  
將騁萬裏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  
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詩的開篇便直言作為軍士早備行裝，自己將要遠行去征討吳國。“江介多悲風”代指長江兩岸戰勢失利，“淮泗馳急流”指淮泗流域軍情緊急。這種形式下，曹植內心焦急，希望馬上渡過長江，但卻可惜沒有大船。這也是表達自己想要報國卻無門的遺憾。最後，他直接表明閒居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寧願為國而戰。黃節的《曹子建詩注》：“蓋黃初四年，吳仍未下……文帝征吳，不得已而休兵。植徙封雍丘後，見江表未平，思渡淮泗以勤王，故有此詩。”<sup>67</sup> 因此，這首詩表達了自己閒居生活的無奈，更突出了急於報國的心情。可見即使處於不遇的境遇，曹植仍不改初衷，一心為國。也正是因為曹植對於國家的關注和忠誠，使其不遇沒有局限於一己的怨恨情感中，而具有了更深沉的愛國主義內涵。

又如其《怨歌行》一首：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  
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  
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  
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幹。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  
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  
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此詩開篇便化用《論語·子路篇》“為君難，為臣不易”句表明自己的無奈，自己的忠心君王不明白，反而被懷疑。接著，用周公輔成王的典故比喻自己心向報國，卻壯志難酬。詩中有“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之句，表明此詩應作於魏明帝即位後。魏明帝曹叡即位後，曹植以為自己的境遇會有所改變，希望有機會被人用，於是幾次上疏求自試，但明帝繼承了其父曹丕對曹植的政策，對曹植的請求不予回應並繼續嚴加防範。當時又有小人進讒言誣陷曹植，其境遇堪憂，於是曹植憤慨之下，寫了這首詩一吐心中的鬱結。但曹植借用周公輔成王的典故來比喻自己似乎不十分恰當，曹植沒有機

<sup>67</sup>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P380。

會像周公一樣輔佐新君，這裏只是借周公也曾遭人懷疑一事來影射自己。詩以表白忠心為主，同時也說明了自己的不遇和壓抑。這種借詠史來抒發自己志向或表達自己不遇的寫作方式對南北朝左思等人的詠史詩具有示範意義。

### (1)含蓄隱喻型

含蓄隱喻型士不遇詩是指詩人不直接表達自己的不遇，而是通過場景的描寫、意象的運用等手段間接地表達情感。建安詩人們繼承了楚辭和樂府詩的寫作特點，融合在自己的詩歌中，表現出了建安士不遇詩的一種新的風格。如劉楨的《贈徐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  
 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  
 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  
 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這是一首與徐幹相互贈答的詩作，此時徐幹為太子文學，正居住在西園，而劉楨因平視甄氏被禁省中。詩中抒發了對徐幹的想念，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內心的壓抑。結合徐幹的答詩和本詩的格調來看，二人在精神上都有種壓抑、苦悶的感傷。詩中以情感為線，以思友為序，前四句寫詩人困於禁錮，接著寫為消憂悶而漫步西苑，感於細柳輕葉隨風飄轉，喚起了作者對精神自由的嚮往，不禁遙望徐幹所在的西園，看到園中景物而更加感傷。他將曹氏與日光相比，日光照耀萬物，公正而不偏頗，但曹氏卻不像日光一樣，這也導致了詩人懷才不遇，甚至遭遇刑罰，從而加重了感傷的情緒。全詩情感濃烈，憂傷但不頹廢，景物描寫具有樂府民歌的淺近自然，情感抒發又有文人詩的細膩深沉。

劉楨出身官宦世家，少年便以才學知名，其性格剛直孤傲。《三國志·魏志·王粲傳》載：“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鹹伏，而楨獨平視。”<sup>68</sup>正因為“平視甄氏”，劉楨“以不敬被刑”。這首詩應作於此次事件之後。然而劉楨自詡品性高潔，為何會做出這樣不合理的行為？筆者認為，劉楨平視甄妃之舉正是因為他的失意和不甘心，他清楚的意識到自己依附曹氏只是御用文人之身，並不能得到重視，這一舉動明顯帶有反抗的意味。因此，這看似簡單的事件實際上說明了文士歸曹後的真實命運。

再看王粲的《雜詩》：

<sup>68</sup> 吳雲主編，《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p553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颿揚塵起，白日忽已冥。  
 回身入空房，托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並！

此詩是建安十六年曹氏兄弟與七子的西園系列之作中的一首。“日暮遊西園”，明確點明是西園之作。而與《雜詩》四首中一樣，“鳥”意象再次成為此詩的中心意象。這只鳥似乎鍾情與詩人，但詩人卻無法與其“比翼雙飛”，於是久久佇立，望著遠去的鳥。忽然風卷塵起，白晝如夜，奇異的天象似乎是對現實的暗示。作者無奈回房，雖然失落卻又有信心等待希望的實現。有學者肯定此詩寫詩人對愛情的追求，但不確定是否有深層的涵義。<sup>69</sup>然而，王粲作此詩時已經三十五歲，這個年紀的古代人已經相當於現在的中年人，無論是思想還是感情上都已十分成熟。同時，建安文士重視傳統道德修養，很少言及兒女情長，因而在王粲年輕時也未見其寫過關於愛情的詩，卻在中年突然萌生情愫，這顯然不合理。而且詩的題目名為“雜詩”，也就是今天的隨感，若是真有愛情因素，應該不會以隨感的形式來寫作。因此，此詩並不是寫對愛情的追求，而是詩人對於現實境遇的不滿和憂慮，只是以戀慕的形式寫出仍然抱有期望。《三曹年譜》引《三國志》卷二三《魏書·杜襲傳》：“魏國既建，（杜襲）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強識博聞，故太祖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見其敬不及洽、襲。襲嘗獨見，至於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知粲雖為侍中，然亦悒悒不安。”<sup>70</sup>由此可知，王粲雖歸附曹操，但仍然如履薄冰，不受重用。因而，曹植在《贈王粲》一詩中安慰王粲說：“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意思是說，只要魏的事業興旺發達，就不必擔心父王的恩澤雨露不沐浴到你的頭上，您還是太多想多慮了，這才有這麼多的憂愁。可與此詩互為參照。

又如徐幹的《室思詩》中“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湧泉。”等句。雖名為室思，實為借思婦而喻不遇，曲折隱晦的吐露心聲。這與其《情詩》有異曲同工之處。詩人入仕十餘年，而只是長期充當侍從文人，這與他的初衷相去甚遠，不能不在年華老去之中有所鬱結，這也是鄴下文人們對時事和人生感傷的源頭。

以上的含蓄隱喻型士不遇詩幾乎都是建安文人們歸附曹魏政權之後創作的。建安中後期，當曹操勢力逐漸強大，由於曹氏父子對文學的愛好和政治的需要，招攬了大批文人。這就造成了天下雖三分，而文人名士卻多集於魏。其中王粲於建安十三年歸於曹操。早在他之前劉楨、徐幹、陳琳、阮瑀、楊修、吳質等人已抵鄴城，和他同年來到的有應瑒、繁欽、仲長統等人。當建安諸子齊聚鄴下後，滿懷熱情的投身於政治，但曹操看中的是他們的文

<sup>69</sup> 吳雲主編，《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p266。

<sup>70</sup> 張可禮編，《三曹年譜》，齊魯書社，1983年，p131。

學才華，這與衝鋒陷陣的將士和運籌帷幄的謀士相比，實用性就不足了。因此，他們擔任的也大多是文學侍從等虛職，地位實同倡優，正所謂“一時名勝，累遭摧折，若禰衡辱為鼓吏，阮瑀屈列琴工，劉楨滅死輪作，皆見遇伶優，僅保首領。文舉、德祖情事稍而相關，便嬰大戮，嘗有尺寸憐才之意！子恒猜忌彌深，二丁駢首，子建幾希，皆幸中之不幸也。”<sup>71</sup>本來建安文士們以為歸附曹氏這樣的明主是自己的幸運，但沒想到曹氏雖重視文人但卻不重用他們，這也是他們的不幸吧。這樣的境遇是導致歸曹文人們常有不遇之感，而礙於曹氏的權威，這種感慨也只能借寫他物而含蓄婉轉的抒發出來。

此外，繁欽也有兩首這種類型的士不遇詩。

《生茨詩》：

有茨生蘭圃，布葉翳芙蓉。寄根膏壤隅，春澤以養軀。  
太陽曝真色，翔風發其莠。甘液潤其中，華實與氣俱。  
族類日夜滋，被我中堂隅。

《詠蕙詩》：

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植根陰崖側。夙夜懼危頹。  
寒泉浸我根。淒風常徘徊。三光照八極。獨不蒙餘暉。  
葩葉永雕瘁。凝露不暇晞。百卉皆含榮。己獨失時姿。  
比我英芳發。鶻鳩鳴已衰。

由於繁欽生平事蹟不詳，這兩首詩的創作時間不明確，是否是歸附曹操後之作不得而知。但據《灌畦暇語》評《生茨詩》曰：“後漢繁欽，傷世道剝喪，賢愚隱情。上之人用察不至，而小人得志，君子伏匿，於是賦生茨之詩。”<sup>72</sup>後一首《詠蕙詩》也同樣都是借物喻人。詩人用茨和蕙草的美好來比喻自己的才華和品格，借它們惡劣的生存環境來比喻當時淒風寒泉般的政治環境。也表現出自己在這種環境中難有所為的悲哀心境。

曹植後期表現士不遇的詩作也明顯具有含蓄隱喻的特點。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運用美人、思婦、棄婦意象來隱喻自己的不得志。如《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發恩義深。  
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和瑟琴。  
行年將晚慕，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沉。  
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  
攀枝長歎息，淚下沾羅襟。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  
昔為同池魚，今為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  
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sup>71</sup> 河北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三曹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0年，p15。

<sup>72</sup>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中華書局，1993年，p385。

此篇明為寫棄婦，實為寫己，油然而興身世之感。以興起篇，先描寫了初婚時的恩愛，繼而寫年老遭棄而悲傷不已。詩中還借用了琴瑟，交頸獸，雙棲禽等意象來比喻初婚時的恩愛，象徵著詩人與曹丕同為公子時的手足之情。但在政治的舞臺上，情誼是不值一提的，因此，當政治地位變化後，這種情誼就蕩然無存了。此詩詩人最後發出“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的悲歎，正是點明了此刻詩人所處的現實狀況及因為政治壓迫所無處發洩的鬱悶。

又如《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  
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眾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  
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曹植心懷壯志，不甘心碌碌無為，一再上表要求“自試”而不得，但又不能直接洩憤，便借美女的不幸來抒發詩人不遇的胸臆。這種美女喻君子的比興方式來源於楚辭，《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前一部分對美人的描寫也可以理解為詩人自喻自己才華和品格的美好；這樣美麗的佳人一心“慕高義”，可想要找到理想的配偶卻很難，儘管自己正當年輕貌美，但卻整日獨處深閨，長歎於深夜不眠之中。全詩含蓄不露，而所怨已很明顯。詩人的心情正如這美人般，心懷一腔熱血卻只能在深夜獨自歎息。

還有一篇《雜詩·南國有佳人》，也是採用比喻的手法，表現懷才不遇的苦悶。但這首詩較《美女篇》更為簡約，寥寥數筆就將佳人“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持”的複雜心情刻畫出來。因此，元代劉履《文選詩補注》（卷二）解釋此篇題旨時說：“此亦自言才美足己有用，今但遊息閒散之地，不見顧重於當世，將恐時移歲改，功業未建，遂湮沒而無聞焉。故借佳人為喻以自傷也。”<sup>73</sup>

此外，曹植還有《閨情》、《七哀》、《浮萍篇》等詩作，也都是以美人或思婦自喻來婉轉地表達自己懷才不遇的哀怨情緒。

### (3)寄託遊仙型

建安士不遇詩中的寄託遊仙類型主要是曹植的詩。遊仙詩帶有典型的道教、神話以及文學色彩。建安時期，曹操開始大量寫作，之後曹丕、曹植均

<sup>73</sup> 河北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三曹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0年，p121。

有遊仙詩。事實上，不僅曹植，包括曹操和曹丕對遊仙的態度也很矛盾，他們一方面渴望長生不老一方面有否定神仙存在的可能性。特別是曹植，曾多次表示對神仙之說的否定，如他在《辯道論》中說：“不信之矣”，在《贈白馬王彪》中也說：“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sup>74</sup>等。既然如此，為何曹植後期又創作了大量的遊仙詩？正如李豐楙所說：“關於遊仙詩的動機，最能反映出詩人的創作意圖；一為空間因素，有現實世界的拘限……”<sup>75</sup>曹植的遊仙詩中的確存在這樣的情況。現實的壓抑讓他無法排遣，一生的志向也無從施展。然而遊仙則提供了一個絕好的途徑，可以讓詩人借助想像來解脫不遇的無奈。如其《遊仙詩》：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虛。  
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  
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詩開篇即說人生在世，難以歡娛。那麼曹植所希望的快樂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就是可以讓他發揮所長，施展才華。回顧曹植一生，其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才高而志向遠大。對於這樣的人來說，生活條件上的艱辛是無所謂的，但精神上的壓抑，理想無法實現才是最痛苦的。因此，曹植說明了自己的這種痛苦無法釋懷才寄託遊仙。他像蟬蛻一樣脫離人間而成仙，飛臨鼎湖，翱翔在九天上，遊覽東西南北四處。在神奇的仙境中他仿佛自由了，然而詩卻沒有結局，正如遊仙也只是一種慰藉一樣，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又如《磐石篇》：

盤盤山巔石，飄飄澗底蓬。我本太山人，何為客淮東。  
蒹葭彌斥土，林木無芬重。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洶洶。  
蚌蛤被濱涯，光彩如錦虹。高彼凌雲霄，浮氣象螭龍。  
鯨脊若丘陵，須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櫂，澎湃戲中鴻。  
方舟尋高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裏，乘颶舉帆幢。  
經危履險阻，未知命所鐘。常恐沉黃壚，下與鼃鰲同。  
南極蒼梧野，遊眇窮九江。中夜指參辰，欲師當定從。  
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籲嗟我孔公。

詩作開篇以磐石起興，然後自述身世，說道自己本生於山東，為什麼客居淮東呢？暗指自己被徙居雍丘一事。這裏蒹葭長滿了鹽鹼地，林木也不茂盛，描寫了雍丘的貧瘠。接著以遊仙的視角描寫了滄海風物的瑰麗壯觀，有如螭龍的蚌蛤、巨大的鯨等。這樣的仙境卻不能平復詩人內心的感傷，一生歷經艱險，卻命運不濟。如今常擔心老之將至，如何面對死亡。這樣的人

<sup>74</sup>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p34。

<sup>75</sup> 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p9。

生進退何從，因此仰天歎息，思念故鄉。最後借用孔子乘桴浮海的典故（《論語·公冶長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來指代自己的“道”無法施行，感歎懷才不遇。

此外，如其《五遊詠》中有“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飽含不遇之情，不禁讓人聯想起《楚辭·遠遊》中的“悲時俗之迫厄兮，願輕舉而遠遊！”<sup>76</sup>

總體來看，建安士不遇詩並不像一般文學史所說的那樣簡單，而是具有多樣的寫作風格和情感態勢。正因如此，也形成了建安士不遇詩中的多重內涵。

首先，表現了建安文士們對自我價值的體認。即他們所憂患的不是傳統儒家的“道不可張”，而更突出對個體價值的關注。這也說明了建安時期文士開始了作為個體的人的自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幾乎沒有個體的人的概念，儒家學說重視的是“為臣”、“為子”，卻沒有“為我”。“為臣”、“為子”強調的是群體性的人的社會概念和宗族觀念，“為我”強調的則是人的本體概念。建安文士們不僅意識到了自我的存在，更要張揚自我存在的價值，即要實現自己的理想。這種意識在士不遇詩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同時，帶有這種意識的建安士不遇詩對於六朝時期大量的懷古、詠史等凸顯詩人個體價值觀念的詩歌大量出現有很大影響。

其次，建安文士們的不遇詩中隱含著對國家的憂患意識。建安前期，社會的動盪、政治的不穩不僅導致文士們仕途上的波折，也加深了他們對國家前途的憂慮。一方面他們已經意識到了自我的存在和價值，強調主體意識；另一方面傳統儒學對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影響是何其深遠，面對悲慘的社會現實，即使自己暫時不能發揮能力，也仍然會生髮出為國為民的憂患。這一點特別在曹植的詩作中表現較多。

再次，對待不遇，建安詩人的處理方式也不同，這反映了建安時代思想的變化。有的悲憤絕望，有的還對前途懷抱希望，有的則表現出向道解脫的意象。這中多樣化也反映了建安時期士人思想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有對傳統儒家“三不朽”觀念的執著，也有對道家遊仙的嚮往，更多的是對現實人生的反思。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文士們重視從自己的經歷出發，對人生進行思考和反思，這對於文學創作表現詩人的世界觀、價值觀等有重要意義。

#### IV. 結論

綜上所述，對建安士不遇詩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從文學的角度來說，建安士不遇詩與之前的士不遇作品相比具有新的特點。其抒情的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詩歌的內涵也更加深刻。

---

<sup>76</sup> 李慶甲校，《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p105。

這不僅是建安詩歌創作多樣化的表現，也對後世的士不遇題材的詩歌創作具有示範意義和重大影響。

第二，從思想的角度來說，建安士不遇詩中表現了與傳統儒家思想不同的價值觀。這反映出了建安時代的思想變動的實際，對中國古代社會思想發展變遷提供了研究的直接資料。

第三，通過對建安士不遇詩的重新解讀，對傳統的研究角度進行了轉換。就建安文人們士不遇詩的創作數量來看，以含蓄隱喻的方式表現的詩作最多，這種類型的詩作大多是文人們歸附曹氏政權之後寫作的。可見，建安文人們在歸附曹魏政權後並未能真正獲得實現自我價值的機遇。因此，深層的人生危機才是引發他們傷逝情懷的根源。在本質上，三曹與建安文人的這種傷逝其實是一樣的。因此，研究建安士不遇詩不應只限於一般的建安文人。

### 參考文獻

-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93年。  
韓格平，《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吳雲主編，《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編，《三曹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張可禮編，《三曹年譜》，齊魯書社，1983年。  
曹道恒，《魏晉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李慶甲校，《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  
孫明君，《漢末士風與建安詩風》，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施建軍，《曹操與建安諸文士》，《江淮論壇》，2003年02期。  
趙國乾，《中國文學“士不遇”主題的文化審美闡釋》，《雲南社會科學》，2004年3期。  
許芳紅，《士不遇文學主題成因初探》，《淮陰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6期。  
孫立群，《古代士人的精神傳統》，《國學》，2010年9期。

### About the Author



Sui Yuzhu completed Bachelor of Arts and Master of Arts degrees in Yanbian University in China. She then went to the Korean where she obtained her PHD degree at the Sungkyunkwan University.